

土耳其“东向”外交与其深层逻辑

胡 雨

[内容提要]自2002年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上台后,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最新表达和体现就是带有强烈地区乃至全球取向的“达乌特奥卢主义”。“达乌特奥卢主义”强调土耳其地缘战略的优势及其历史文化的关联性,主张扭转过去一味倚重西方的“一边倒”外交,致力于发展与周边国家尤其是穆斯林国家的友好关系,注重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力图充当地区冲突的调解人,并突出“软实力”的重要性。

[关键词]土耳其 “东向”外交 达乌特奥卢主义 “零问题外交”

[作者简介]胡雨,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东地区政治与经济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降,土耳其外交政策由“凯末尔主义”向所谓“新奥斯曼主义”范式转移,逐渐改变了过去单方面、单向度和消极的亲西方政策,转向多方向、多层面和积极进取的全方位外交。¹2002年11月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后,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种被西方舆论称之为“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或“东向”政策(Looking East)的土耳其新外交,强调发挥土耳其固有的“战略纵深”优势,借助其不断壮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拓宽和深化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东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和地区影响力。土耳其“东向”外交对西方和周边国家造成了很大的震撼和冲击,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一、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

1923年凯末尔革命胜利后,以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和现代化为特征的凯末尔主义一直是土耳其立国之本。对于凯末尔主义者而言,世俗主义代表了“进步”和“文明”,而伊斯兰则意味着“落后”和“东方野蛮主义”。^④基于此,凯末尔主义对内追求与西方全面接轨的西方化,对外奉行亲西方的“一边倒”

外交政策。二战结束及冷战爆发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土耳其顺理成章地与西方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1952年土耳其正式加入北约,成为西方阵营中的重要一员。此后,它成为北约遏制苏联的“侧翼国家”(wing country),是北约防止苏联向地中海、中东地区渗透的堡垒。在地区事务上,土耳其并不把自身看作中东地区体系的一部分,一般避免与中东国家保持潜在的纠葛和联系。即便其有限的中东政策,也只是其亲西方政策的逻辑延伸,旨在迎合美国亲以色列的政策。也因此之故,1949年土耳其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土以长期保持着以军事、情报合作为内容的隐性战略关系。事实上,与美国、以色列的同盟关系被土耳其视为自身安全战略的核心基础。^④正因如此,西方国家一直把土耳其视为穆斯林世界实现世俗化、民主化改造的成功典范,以及西方通向穆斯林世界的桥梁。

冷战结束前夕,历经70年之久的凯末尔主义外

¹ Alexander Murinson,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6, November 2006, p. 946.

^④ M. Hakan Yavuz, *Islamic Political Identity in Turk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6.

^④ Raymond Hinnebusch,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45-146.

交开始在土耳其遽然转型。在图格特·厄扎尔执政时期 (Turgut Ozal 1983 - 1993), 土耳其日益青睐“新奥斯曼主义”外交哲学。“新奥斯曼主义”一词由土耳其学者森格斯·坎达 (Cengiz Candar) 率先提出, 并演变发展为一场思想运动。该思想重温奥斯曼帝国昔日的荣光, 憧憬土耳其再现穆斯林、突厥世界领袖和欧亚大陆中心强国的未来, 力主摒弃一味亲西方的外交政策, 追求基于奥斯曼历史传统, 积极进取和平衡多样化的新外交。¹ 尽管如此, 由于内外形势的不成熟, 厄扎尔政府外交政策调整差强人意, 无果而终, 而短暂执政、具有强烈伊斯兰主义性质的繁荣党埃尔巴坎政府命运多舛, 壮志难酬。2002年11月正发党执政后, “新奥斯曼主义”外交理念获得了新的理论根据和现实动力, 并变得愈加清晰和成熟。

首先, 土耳其缓和并修复了与伊朗、叙利亚、亚美尼亚等邻国的长期紧张关系。在政治上, 土耳其与伊朗、叙利亚等国实现了高层互访, 2009年10月的一周内, 土耳其与伊、叙分别签署了40多项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一揽子协议; 实现了与亚美尼亚关系的正常化; 妥善处理了与希腊存在的塞浦路斯问题; 在维持伊拉克完整统一的基础上, 承认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合法性。在经济上, 土耳其与伊朗的双边进出口贸易额从2000年的1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02亿美元, 与海湾六国的贸易额也从2002年的2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66亿美元, 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从2002年的近70亿美元陡升至2009年的288亿美元, 增长了4倍, 达到300亿美元; 强化了与中亚、高加索国家的能源合作; 土耳其对穆斯林国家的出口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显著增加, 对中东国家出口的份额由2002年的9.6%增至2010年的20.3%, 对非洲 (包括北非穆斯林国家) 的贸易出口由2002年的4.7%升至2010年的8.2%, 而对欧盟出口的份额却从2002年的56.5%降至2010年的46.3%。可以说, 穆斯林世界已经成为了土耳其经济的“氧气”。不仅如此, 2010年6月土耳其和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决定, 拟于2011年正式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 雄心勃勃的土耳其更设想建立一个西至摩洛哥、北到中亚、南达也门、东及巴基斯坦的大中东地区自由贸易区。^④

其次, 土耳其深化了与俄罗斯、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现在, 俄成为土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 土进口天然气的66%和进口原油的25%都来自俄罗斯。^(四) 同时, 两国的政治联系也日趋变暖。2004年, 普京实现了32年来俄罗斯领导人对土耳其的首次国事访问, 双方签署了《深化友谊和多层面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俄土日益加强的双边关系, 使得土耳其不愿意支持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民主输出计划, 并对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保持中立态度。土耳其也努力深化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 中土两国计划将双边贸易额从2009年的约170亿美元在5年内增加2倍, 2015年达到500亿美元, 2020年达到1000亿美元。^④ 2010年9月, 中土两国在土耳其境内举行了联合空中军事演习。西方国家认为, 允许中国空军和一个北约盟国举行军演构成相当的安全风险, 中土军演可能会暴露北约重要的军事机密。^⑤

最后, 土耳其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 努力充当地区和国际事务的调解人, “尽其最大努力使西方与东方和好、北方与南方和谐”。^⑥ 土耳其积极充当以色列与叙利亚纷争、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的调停人; 反对由美国牵头的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的第4轮制裁决议, 批评西方国家采取双重标准, 对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保持缄默, 并携手巴西与伊朗签署了“核燃料交换协议”, 试图充当伊朗核危机的调解人; 强烈抨击外国势力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 土不但未追随和参与西方国家孤立伊朗、叙利亚、苏丹和哈马斯的行动, 而且还与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国家和组织频频接触, 超越了西方国

¹ Alexander Murinson,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6 November 2006, pp. 946-947.

^(四) Mahir Zeynalov and Selvi Öztürk, “Increasing Trade with Muslim Countries Becomes Turkey’s Economic ‘Oxygen’”, *Zaman Amerika*, January 30, 2011.

^(四) F. Stephen Larabee, “Turkey’s Eurasian Agend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4, No 1, Winter 2011, pp. 111-112.

^④ “中国与土耳其建立战略新关系, 推动经贸往来翻倍增长”,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hinaNews/idCNCHNA-3125120101009> (上网时间: 2010年12月10日)

^⑤ “China Mounts Air Exercise with Turkey, U. S. Say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0/10/08/us-china-turkey-usa-idUSTRE6975HC20101008> (上网时间: 2010年12月2日)

^⑥ 参见土耳其外交部中文网站, Transcripts available http://www.mfa.gov.tr/chinese_en_mfa (上网时间: 2010年11月10日)

家所能容忍的“道德红线”。¹ 土耳其还以突厥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代言人和保护者自居,其视野之远,甚至到达了新疆地区。负责土耳其伊斯兰事务的权威机构——宗教事务局局长麦赫迈德·戈迈兹宣称:“本人将根据原则精神致力于服务全世界的穆斯林、全球被压迫民族和所有穆斯林少数民族。”正如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梅瑞森所指出的,土耳其利用新奥斯曼的话语在中东外交政策中表现出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形象。^④

在土耳其与非西方国家关系日渐热络的同时,它与西方国家及其盟友的关系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以色列,都日益疏远和冷淡。正如土耳其学者塔瑞克·奥古祖鲁所言,土耳其外交政策日趋“中东化”,其受中东地区事件的影响远超过受欧洲的影响。⁽⁴⁾ 近些年来,土耳其“东向”外交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化表达,这就是目前已经声名鹊起的“新外交战略”。如果要深刻理解土耳其的东向外交,我们还需要联系土耳其近年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处境,对这种新外交的思想基础加以准确把握。

二、达乌特奥卢的外交战略思想

从深层次分析,土耳其奉行外交新战略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哲学基础和现实动因。充分探明这一点,也许正是我们恰当地解读土耳其战略转向的一把钥匙。

土耳其“东向”外交的理论基础体现在现任外交部长达乌特奥卢历来所倡导的“战略纵深”学说中。⁵ 阿赫迈特·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是正发党外交智囊、土耳其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曾担任贝伊肯特大学(Beykent University)国际关系系主任。达乌特奥卢自2009年5月担任外长后的一年间,出访多达100次,其中出访欧洲28次、中东27次、巴尔干18次、亚洲9次、美国8次,被国际媒体誉为“土耳其的基辛格”。⁶ 与此同时,他也对土耳其的外交战略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省、思考和重新建构,形成了颇具影响的“达乌特奥卢主义”(The Davutoğlu Doctrine)。他也因此而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2010年全球100名思想家”。

达乌特奥卢的外交战略思想主要发表在其一系列重要著述中,如《战略纵深:土耳其的国际地位》、

《文明转型和穆斯林世界》、《利益的冲突:世界秩序/失序的诠释》等。⁷ 作为土耳其“东向”外交思想基础的“达乌特奥卢主义”,主要包含了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伊斯兰文明为穆斯林世界提供了“想象共同体的共同性”。“伊斯兰文明普适性的主要因素在于其本体论意识,它直接浸淫每一个体的心灵,而不论其族群和地域渊源。在迥异的穆斯林世界,以共同文化和政治因应殖民主义和现代性就是此意识本身的见证。”^⑧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差异和分歧是根深蒂固的,这些差异和分歧主要源于截然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和理论背景,而非仅仅是制度和历史。缺乏价值正当性而仅仰赖物质优越性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终极和完美形态。从长时段的历史观来看,尽管穆斯林世界丧失了文明的决定性地位,但它却可能再次复兴,这符合古典时间观的“时代循环论”。这种复兴有待于伊斯兰文明的价值革新,而非抛弃它们去迎合、适应西方的特征。⁽⁴⁾但现今穆斯林世界尚无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发展反体系力量、奉行反体系的全球性战略。因此,穆斯林世界在与西方文明互动的进程中应该保存选择性和高度小心翼翼。

第二,力求建立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以避免可能的冲突。达乌特奥卢批判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¹ William Hale and Ergun Özbudun, *Islamism, Democracy and Liberalism in Turkey: The Case of the AKP*,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46-147.

^④ Alexander Murinson,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6, November 2006, p. 953.

⁽⁴⁾ Tark Oğuzlu, “Middle Easternization of Turkey’s Foreign Policy: Does Turkey Dissociate from the West?”, *Turkish Studies*, Vol. 9, No. 1, 2008, pp. 3-4.

⁵ James Traub, “Turkey’s Rul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 2011.

⁶ Ziya Meral and Jonathan Paris, “Decoding Turkish Foreign Policy Hyperactiv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3, No. 4, October 2010, p. 80.

⁷ Ahmet Davutoğlu, *The Strategic Depth: The Turkish International Location*, İstanbul: Küre Yayınları, 2000; Ahmet Davutoğlu, *Civil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uslim World*, Kuala Lumpur: Mahir Publications, 1994; Ahmet Davutoğlu, “The Clash of Interests: An Explanation of the World (Dis) Order”, *Percep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 No. 4, December 1997-February 1998.

^⑧ Ahmet Davutoğlu, “It’s Only Natural”, *Al-Ahram Weekly*, No. 564, December 2001, pp. 13-19.

⁽⁴⁾ See J. Scott Carpenter and Soner Cagaptay, “Regenerating the U.S.-Turkey Partnership”,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No. 2, November 2010, p. 8.

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两种理论皆罔顾事实,充斥着“西方中心论”思维和政治偏见,都把伊斯兰视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从现有实力来看,穆斯林世界也无足够的资源去抗衡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西方杜撰的所谓“穆斯林威胁的神话”,旨在为控制土耳其的战略潜力,延续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战略和战术合作提供意识形态的正当性。¹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全球战争恰是文明内部的战争,发生在欧洲中心文明的体系力量之间,这一战争决定了谁担当体系领导、谁之规则统治、谁之政策形塑体系分配过程、谁之秩序观占据支配地位”。^④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远非仅由冲突所构成,亦充满了正面的交融重叠,一个全方位的文明对话将是全球合法性国际秩序的基础。

第三,土耳其不是一般性的国家,而是一个具有战略纵深的“中心强国”(central power)。达乌特奥卢认为,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具有的战略纵深(strategic depth),而战略纵深是由地缘深度(geographical depth)和文化深度(historical depth)两大要素所构成。从地缘深度上讲,土耳其居于三个地缘政治同心圆的中心(concentric geopolitical circle),即巴尔干、黑海盆地和高加索,中东和东地中海、波斯湾、非洲和中亚。作为一个兼具中东、巴尔干、高加索、中亚、里海、地中海、黑海国家等多重身份的土耳其,其地缘政治位置决定了它的外交政策绝不能是消极的,理所当然应对上述地区施加影响,应利用地缘优势贯彻积极首创外交。^⑤从历史深度来看,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中历来占有重要地位,它与众多穆斯林国家有着传统的不可分割的“脐带关系”;作为前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与上述地区的国家有着天然的传统纽带、文化嵌入和历史责任。有鉴于此,土耳其应该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对待其“奥斯曼遗产”(Ottoman legacy),这是促进土耳其国家力量的宝贵财富。美国学者斯南·乌尔根指出:“土耳其政治精英把土耳其视为穆斯林世界的领袖,其介入中东如同国家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⑥

基于此,达乌特奥卢抨击过去凯末尔主义的亲西方外交政策是“静态、单向度、不平衡的”,带有

“安全化特点的外交议程”,即基于威胁认知、过分强调安全因素的防御性外交。土耳其应该抛弃那种单纯依附甚至曲意奉承西方国家的政策,摈弃把自身定位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桥梁国家”或“侧翼国家”的战略定位,因为这种定位只能使其沦为促进西方国家战略利益的工具和附庸,丧失自信,作茧自缚。相反,土耳其理应奉行一个“积极、多面向、平衡”以及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的新外交战略。凭借其固有的战略纵深和潜在实力,成为一个“中心强国”、“枢轴国”(pivotal state),成为地区秩序的缔造者和穆斯林世界的领袖。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土耳其需排除两大障碍,即解决国内的库尔德问题、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第四,提出与近邻国家的“零问题外交政策”(Zero Problem Policy with Neighbors)。战略纵深理论要求土耳其与其邻国进行积极主动的接触战略,重拾其历史和地缘身份认同,在地区和全球脉络下重估自身位置,形成自己的战略轴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达乌特奥卢提出了一套非常独特的“零问题外交政策”,以期土耳其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政治关系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⑦其具体含义包括:土耳其要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和纠纷,担当解决地区冲突的领袖角色,成为“问题的解决者”、“地区秩序的缔造者”,克服影响土耳其发挥其全球行为体影响的障碍,为全球和地区和平发展做出贡献。为此,土耳其宣布了中东政策的四条原则:安全为人人,不为任何特定的集团或国家;对话作为解决危机的优先途径;经济相互依存;文化共存和多样

¹ Alexander Murinson,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6, November 2006, p. 950.

^④ Ahmet Davutoğlu, “The Clash of Interests: An Explanation of the World (Dis) Order”, *Percep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 No. 4, December 1997, p. 1.

^⑤ Ioannis N. Grigoridis, “The Davutoğlu Doctrine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ELAMEP Working Paper*, No. 8, April 2010, Athens: Greece 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 (ELFAMEP), p. 5.

^⑥ Sinan Ülgen, “A Place in the Sun or Fifteen Minutes of Fame: Understanding Turkey’s New Foreign Policy”, *Carnegie Papers*, No. 1, December 2010,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 6.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turkey_new_foreign_policy.pdf (上网时间: 2011年1月18日)

^⑦ M. Hakan Yavuz, *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02–203.

性,尤其考虑族群和教派的差异性。¹正是基于这一政策,达乌特奥卢要求在中东地区,尤其要与伊朗、叙利亚和海湾国家“重新接触”;在巴尔干强调希腊、保加利亚的重要性;在高加索突出格鲁吉亚与土耳其关系的坚固性;要求与所有的全球和地区行为体发展“平衡、不偏不倚的正常关系”;在现阶段,土耳其仍要小心翼翼、审时度势,在大国设定的“战略边界”(strategic parameters)内调整外交政策;在致力于发展与周边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同时,特别重视相关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致力于与地区所有国家建立强大的经济纽带关系和发挥杠杆作用,挖掘尚未利用的经济和战略潜力。

第五,强调软实力在新外交中的作用。作为当今世界一个富有活力的成员,土耳其活跃在众多地区的国际事务中,并凭借其连通欧亚的地缘位置和影响广泛的历史文化,成为促进和增进不同文化间对话和互动的重要角色。达乌特奥卢认为,土耳其要善用伊斯兰话语来传播普适性的文化价值,应该支持中东地区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使具有伊斯兰民主和市场经济特色的“土耳其模式”和“伊斯兰中道观”(Islamic moderation)推而广之,借此最终实现西方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某种沟通、对话与和解。^④而在传播其价值观的过程中,土耳其应非常谨慎地不被穆斯林视为西方的代言人,在此前提下,土耳其的软实力就能够转化为经济、文化和政治影响力。

在2009年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达乌特奥卢详尽地阐明了新时期土耳其外交的三个方法原则和五个行动原则。三个方法原则包括:其一,“愿景”途径代替冷战时期“危机导向”的态度,土耳其要高瞻远瞩,勇于担当重任,引导利益攸关者,凝聚共识,建立共同价值、信念和目标,推动进步和发展。其二,土耳其外交政策应建基在“持续性和系统性”的框架之上,即其中东外交理念不应与其中亚或巴尔干外交政策相互矛盾、背道而驰,非洲政策也不能与亚洲政策相互对立,应该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其三,采取新的话语和外交风格,促进土耳其软实力的传播。五个行动原则,一是安全与民主之间的平衡,任何政权的正当性源于为公民提供安全和自由的能力,而安全的提供不应该以牺牲自由和

人权为代价;二是与邻为善、与邻为友的“零问题”原则,寻求与邻国之间的友好合作、相互依存关系;三是“主动、首创的和平外交”(proactive and preemptive peace diplomacy),旨在透过积极、预防性外交举措,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四是多层次的外交政策(a multi-dimensional foreign policy),土耳其与其他全球行为体的关系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取长补短、互利合作;五是节奏外交(rhythmic diplomacy),期许土耳其在国际关系领域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主动加入所有的国际组织,充分参与全球所有重要事务。^④2010年7月8日,达乌特奥卢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指出:“我们正贯彻一个愿景政策,这就是软实力、仲裁调解、接触与和平。我们期望一个有着高级政治对话、共同安全环境、高度经济依存、多元文化及多元宗教和解共生的中东。”^{1/4}

达乌特奥卢外交战略思想的独特性在于:强调土耳其外交战略的多方向、多层次原则,注重建立自己的外交议程和优先性,借助国际战略的重组和转型,确立其在欧洲、中亚和中东的关键性国家和全球中心强国的地位和作用。^{1/2}战略纵深理论是一种集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建构主义的文化认同以及软实力新工具为一体的新思维,它既是对土耳其传统外交思想的继承,如传统均势思想、地缘政治决定论、色佛尔综合症、泛突厥主义、泛土耳其主义等,也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对土耳其战略思想的发展。^{1/4}这个理论的最大亮点,是对土耳其文化优势

¹ “Turkey’s Top Foreign Policy A ide Worries about False Optimism in Iraq”, interview in Turkey with Ahmet Davutoğlu,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September 19, 2008 <http://www.cfr.org/turkey/turkeys-top-foreign-policy-a-ide-worries-false-optimism-in-iraq/pl7291> (上网时间:2010年1月14日)

^④ See Landon Thomas Jr., “In Turkey’s Example, Some See Map for Egyp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2011

^④ Ahmet Davutoğlu, “Turkey’s Zero-Problem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Journal*, May 20, 2010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5/20/turkeys_zero_problems_foreign_policy (上网时间:2010年12月6日)

^{1/4} Ahmet Davutoğlu, “The Role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Davutoğlu’s Speech at Chatham House in London July 8, 2010 pp. 9-17.

^{1/2} Alexander Murinson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6 November 2006 pp 951-953

^{1/4} See Meliha Benli Altunisik “Turkey’s Iraq Policy: The War and Beyond”,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14 No 2 2006 p 193

和软实力、扮演解决地区冲突角色、经济一体化、双赢策略的论述,它反对抛弃伊斯兰传统,要求强化伊斯兰认同,强调自身固有的伊斯兰性格和特点,并借此顺利实现与东方,尤其是穆斯林国家的融合,从而担当东西方之间的沟通、枢轴和调停角色。¹

三、“东向”政策的根源和动力

尽管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正发党“东向”外交政策的根源和动力似乎是由其政党的性质和趋向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正发党的伊斯兰认同和伊斯兰议程必然规定其外交政策“伊斯兰化”(Islamisation)。但事实上,那种认为他们是伊斯兰主义的甚至意识形态倾向的观点是过于简单化和错误的认识。^④实际上,土耳其“东向”外交是在其国内外各种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反面的因素的刺激和推动下塑造而成的。更具体地说,土耳其自身实力的提升、自我认同的变迁和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构成了其外交走向的真正决定性变量。

近年,土耳其经济迅猛增长,在2002-2007年正发党执政的第一任期间,年均增长率高达7%,出口额从2002年的360亿美元陡升至2008年的1320亿美元,GDP总值接近7300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17大经济体。^④就GDP总量来看,不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抑或世界银行的数据,不论按汇率计算还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土耳其已经超过印尼,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在中东地区,其经济实力更是首屈一指,“为整个阿拉伯世界所仰慕”,是名副其实的“中东大国”。^⑤按达乌特奥卢的设想,土耳其在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也就是到2023年,其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十位,将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五六个大国之一。^⑥正因如此,不论是“二十国集团”(G20)还是“灵猫六国”、“金砖十一国”等新称谓,土耳其都榜上有名,充分体现了其实力和潜力不可小觑。不过,土耳其快速的经济增长缺乏充足的能源支撑。为满足国内能源需求、开拓东方市场,土耳其与能源资源丰富的沙特、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俄罗斯等国签署了一系列能源和贸易合作协议。尤其是与俄罗斯、伊朗的能源不对称依赖关系,使得土耳其对俄、伊的关注和反应更

加敏感。土耳其在积极寻求能源安全和多元化的同时,也期望成为“石油天然气生产地区与欧洲市场之间的中转枢纽”。^⑦能源因素已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推动因素之一。^⑧

与综合国力的提升相伴随,土耳其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增强,其固有的历史文化意识和伊斯兰认同迅速苏醒,这构成了土耳其“东向”政策的重要驱动力。今天的土耳其人以一种更加正面、积极的态度看待奥斯曼帝国和“奥斯曼遗产”,强调充满多元文化认同的“奥斯曼遗产”是土耳其承担地区和全球角色不可或缺的要害。^④在国际事务中,许多土耳其人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困难处境,反感和痛恨美国袒护以色列。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后,土耳其出现了举世罕见的反美主义浪潮,这甚至成为美土关系的结构性问题。土耳其政府认为,美国支持下的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控制区扩大和库尔德地区政府成立,将导致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死灰复燃,对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严重威胁。^④利用“奥斯曼遗产”在中东、中亚、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施展积极的接触外交,在土耳其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和正发党成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⑩由此看来,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也构成其“东向”外交政策的重要驱动力。

¹ Alexander Murinson,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6, November 2006, p 945.

^④ F. Stephen Larrabee, “Turkey’s New Geopolitics”,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52, No 2, April/May 2010, p 158.

^④ Hugh Pope, “Pax Ottoman? The Mixed Success of Turkey’s New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10, p 163.

^⑤ Landon Thomas Jr., “In Turkey’s Example, Some See Map for Egyp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2011.

^⑥ 李玉东:“面向全球的土耳其外交新思维”,《光明日报》2010年1月23日。

^⑦ F. Stephen Larrabee, “Turkey’s Eurasian Agend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4, No 1, Winter 2011, p 104.

^⑧ Cengiz Candar, “The Kurdish Question: The Reasons and Fortunes of the Opening”, *Insight Turkey*, Vol 11, No 4, October-December 2009, p 15.

^④ Yilmaz Coşkun, “Ottomanism vs. Kemalism: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1990s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4, 2006, pp 587-590.

^④ Ioannis N. Gregoriadis, “Friends No More? The Rise of Anti-American Nationalism in Turke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4, No 1, Winter 2010, pp 55-56.

^⑩ F. Stephen Larrabee, “Turkey’s New Geopolitics”,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52, No 2, April/May 2010, p 159.

就外部驱动力而言,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安全环境的变化,使得它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失去有效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冷淡和傲慢促使土耳其不得不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东方文化上的“近亲”。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使土耳其长期面对的安全威胁大大降低,也导致其与西方国家战略关系的重要性降低。在冷战期间,土耳其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的苏联,而今天,土耳其面临的是来自南方、东方的更加多元化的安全威胁和挑战。从库尔德民族分裂主义、伊拉克的教派冲突、伊朗的核武器计划、黎巴嫩的宗教极端主义到潜在的什叶派势力联盟等,不一而足。正如美国学者格雷厄姆·富勒所言,“在战略上,土耳其已经成为了中东的一部分”。¹ 由于其安全重心已经转移,面临的周边形势与国际环境发生转向,土耳其原有外交战略模式自然难以为继。尽管西方继续把它视为盟国,但毕竟支撑同盟的理由和基础已经动摇,土耳其对西方国家的安全依赖业已大大降低,双方对于地区利益和威胁出现认知差异,彼此都处于某种战略调整和转变的不确定阶段。^④ 另一方面,苏联的解体也为土耳其重塑新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机遇。先前在苏联控制下封闭的突厥世界的大门骤然打开,土耳其政治家把中亚、高加索地区视为扩大本国影响力不可或缺的契机。土耳其寻求利用这一新的外交灵活性和纵横捭阖空间,在这些地区建立新的关系,给自身提供成为“战略强国”(a strategic power)的机会。

从地区权力结构来看,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突变促使土耳其不得不在此抢占先机。由于美国贸然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打破了海湾战争后所形成的微妙地缘政治均势,在不经意间为反美的伊朗、叙利亚势力在中东地区发展壮大消除了障碍。中东战略平衡日益向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等所谓“北梯”(northern tier)国家倾斜,北梯国家正构成和代表了该地区的未来“影响力轴心”(axis of influence)。相形之下,传统地区权力中心的沙特、埃及等“南梯”(southern tier)国家的影响力将逐渐下降,亲美亲西方的埃及、沙特面临着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换代困境和合法性危机。^⑤ 随着美国从伊拉克战场撤出期限临近,中东地区的权力真空日渐凸显,地

区国家之间的博弈愈加激烈。在整个中东地区,土耳其更具有某种特殊的地缘优势和软实力。与其他中东大国相比,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冲突各方均能接受、左右逢源的利益攸关方,更具充当“第三方角色”的空间,因此它自然也不会放过填补“中东地区权力真空”和纵横捭阖的良机。

长期以来,土耳其倾向西方的主要目标就是希望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欧洲迟迟不愿接纳土耳其为欧盟成员国,让它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和“沉默的耻辱感”。欧洲国家尤其是德、法强烈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认为土耳其不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将拖累欧盟,它所具有的伊斯兰文化和宗教使其更不充分具有“欧洲性质”。在欧洲人眼中,土耳其不过是一个与欧洲集体意识和认同截然不同的“他者”,如果贸然让一个有7000多万穆斯林的土耳其加入欧盟,将极大地改变欧盟的结构和属性。为了对其进行安抚,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提议给予土耳其一种含糊其辞的“特殊伙伴地位”(privileged partnership),而不是正式成员地位。正如德国前外长费舍尔指出:“欧洲现在的政策却不是尽可能地拉拢土耳其,使其靠近欧洲和西方国家,而是将其驱入俄罗斯和伊朗的怀抱。”^⑥ 对于土耳其人而言,他们一直满怀热情地期望着向西方靠拢,却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欧盟的哄骗、疏远和排斥。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刺激了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情绪,其主流舆论和实践越来越伊斯兰化。民调显示,在2004年,有73%的土耳其人支持加入欧盟,而在2006年下降到54%,2009年更降至48%。^⑦ 由此可见,土耳其外交向西倾斜的民意基础正在一步步被销蚀。

¹ Graham Fuller, “Turkey’s Strategic Model: Myths and Realiti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3 Summer 2004, p. 59.

^④ Stephen J. Flanagan, et al., *Turkey’s Shifting Dynamics: Implications for U. S. - Turkey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The CSIS Press, 2008, p. 1.

^⑤ Alastair Crooke, “The Shifting Sands of State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3, No 3 July 2010, p. 7.

^⑥ 约施卡·费舍尔:“谁‘失去了’土耳其?”[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7月7日。

^⑦ See F. Stephen Larrabee, “Turkey’s New Geopolitics”,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52, No 2, April/May 2010, p. 173.

四、土耳其“东向”外交的前景

进入21世纪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战略重心“东移”态势日趋明朗,过去由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格局正逐渐走向多极世界态势。在此情形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做出机动灵活的判断、审时度势的选择。土耳其“东向”外交正是顺应国际潮流、适应世界局势的战略调整,反映出它面对自身所处国际环境变化的灵活应变,也是其克服冷战时期的反常状态、回归常态的表现。可以预见,土耳其“东向”战略转移将在来年得以强化,土将继续拓展周边非西方国家的外交空间,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当然,对土耳其的“东向”外交政策应该有一个相对客观和谨慎的认识。在现阶段,土耳其“东向”外交政策仍属于调整性和传承性变化,更多关涉数量变化而非根本性变化,它的外交政策基本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蜕变。^①从近期态势发展演变来看,正发党外交政策基本上依然是民族主义、土耳其中心论和商业机会主义的复合体。^②土耳其并未脱离北约,也未放弃加入欧盟的努力。土总理埃尔多安也矢口否认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轴心外交政策发生转移,但表示其也不可能无限期地要求加入欧盟。为了防止土耳其“战略漂移”(Strategic Drift)的严峻后果,西方国家不得不借助警告、监督、关切、要求、鼓励、支持、安抚、许诺、援助等手段和举措,多管齐下、软硬兼施,竭力维系与土耳其的战略同盟关系。^③在未来,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日益微妙和复杂化。在维持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土不愿被西方所支配和控制,而是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实现一种持中、平衡的外交政策,以此获得更为宽广的国际空间和更受尊重的国际地位。

也有学者对“战略纵深”理论持不同意见,认为它夸大了土耳其地缘政治地位和历史文化影响力。土耳其实力和资源有限,军方和文职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内部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纷争,库尔德问题也悬而未决。作为一个漂泊不定、“自我认同撕裂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寻找新的角色和认同有相当的难度。^④基辛格曾在《华盛

顿邮报》上撰文,提出了当今世界正处于三次革命的过程之中,此即欧洲传统国家体系的转型、极端伊斯兰主义挑战主权的历史观念以及国际事务的重心正由大西洋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转移。^⑤作为正处于三次革命浪潮风口浪尖上的土耳其,势必对今后的走向做出战略选择。诚然,这种变化不会在旦夕之间发生,而是一种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过程。

不管怎样,土耳其未来外交依然面临两种战略选择,一是向西靠拢,进入欧盟,成为欧盟的一部分;二是向东靠拢,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传统穆斯林国家结为密友。^⑥到2023年,也就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可能是土耳其做出战略选择的临界点。倘若届时欧盟仍不接纳土耳其,土可能另辟蹊径,强化其“东向”战略。也许,源于其独特的地缘关系和历史文化传统,土耳其本身就不适合于某种既定的世界秩序概念,基于其自身实力和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又不得不做出新的自我定位和选择。^⑦或许土耳其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巧妙的平衡,既不与西方疏远,也更加积极地融入东方,超越要么西方要么东方简单的二中择一、非此即彼,从而达到二者综合,实现一种新的、深度的二重性,即追求“西方价值观”与恪守“东方认同”相得益彰的全新局面。^⑧ ○

(责任编辑:马燕冰)

^① Charles Hermann, "Changing Course When Governments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4, 1990, pp 2-21.

^② Hugh Pope "Pax Ottoman? The Mixed Success of Turkey's New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10, p 162.

^③ Sally M. Namara, Ariel Cohen, Ph. D., and James Phillips, "Countering Turkey's Strategic Drift",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 No 2442, July 26, 2010, p 17.

^④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 42.

^⑤ Henry A. Kissinger, "The Three Revolutions", *Washington Post*, April 7, 2008.

^⑥ Philip H. Gordon and Omer Taspinar, *Winning Turkey: How America, Europe, and Turkey can Revive a Fading Partnership*,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 4.

^⑦ Hugh Pope "Pax Ottoman? The Mixed Success of Turkey's New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10, p 161.

^⑧ M. Hakan Yavuz, *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03.